

【区域创新发展】

以品质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及其创造力 经济效应*

林善浪 凌家慧 林泽宇

摘要:中国正迈入后工业化、后人口转型和城镇化后期阶段,城镇化发展模式将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内涵型转变,意味着长期形成的工业化、城乡人口流动和城镇化互动格局面临新的变革,城市品质成为城镇化新阶段的关键变量。城市品质吸引创造力人才集聚,推动创新活动和创业活动的空间集聚,带动由创造力驱动、以创新创业活动为基础的创造力经济发展。为此,必须优化城市“软”环境,推动人才自由流动,建设创新型和创业型城市,培育和发展城市创造力经济。

关键词:城市品质;新型城镇化;创造力;创造力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5)01-0062-11 收稿日期:2024-1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交通网络视角下城市经济韧性及其传染效应的形成机理和优化策略研究”(23BJY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善浪,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 200092)。

凌家慧,女,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092)。

林泽宇,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通信作者(上海 200092)。

经过40余年的快速城镇化,中国新型城镇化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传统规模速度型的外延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如何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环境,谋划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方向和可行路径。以城市品质为切入点,探索城市品质、创造力人才集聚、创新创业活动集聚和城市创造力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新型城镇化新阶段以品质为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乡村社会向全面小康的城市社会转变的人类奇迹,开辟

了一条既遵循普遍规律又独具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路径。

(一)中国新型城镇化正迈入新阶段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城镇化进程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城镇化后期阶段,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城镇化率接近纳瑟姆曲线第二个拐点,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可转移的潜力空间正在缩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83%,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2023年上升到66.2%。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33亿人,比欧盟27个国家人口总和多4.83亿人。这是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进程。美国城市地

理学家纳瑟姆(R. Northam)提出的城镇化曲线表明,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发展通常分为初始阶段、加速阶段和饱和阶段。初始阶段指城镇化水平低于30%,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的准备时期;加速阶段指城镇化水平超过30%后出现第一个拐点,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饱和阶段指城镇化水平达到70%后出现第二个拐点,发展速度逐渐趋于平缓,进入成熟期(Northam, 1979)。根据纳瑟姆曲线判断,中国城镇化率即将达到70%的第二个拐点,之后城镇化速度将趋缓。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第一产业、第二

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存在差距,可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仍然存在一定的潜力空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3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4005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81.4%。另一方面,中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2010—2023年平均每年增长10.5%,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从1:5.12缩小到1:3.85(见表1),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可转移的潜力空间正在缩小。

第二,中心城市、都市圈与城市群成为新型城

表1 2010年和2023年中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年份	产业	增加值 (亿元)	从业人数 (万人)	生产率 (万元/人)	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生产率之比
2023	第一产业	89755	16881	5.32	1:3.85
	第二产业	482589	21546	22.40	
	第三产业	688238	35614	19.33	
2010	第一产业	40497	27931	1.45	1:5.12
	第二产业	186481	21842	8.54	
	第三产业	171005	26332	6.4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自制。

镇化主要空间形态。区域中心城市具有经济增长、就业和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吸引流动人口的中心。随着户籍体制改革的深入,人口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将更加明显。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全国36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常住人口增加7517.7万人,十年间增长了25.2%。随着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镇通勤交通的建设和完善,都市圈呈现加快发展的趋势。同时,中国已形成或正在培育多层次、多规模的城市群,正在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以促进城市群发展为抓手,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新华社,2021)。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分别增长了35%和12%(桐欣,2024)。

第三,跨区域人口流动格局逐步从以乡城之间流动为主转变为以城城之间流动为主。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增量的减少,中国人口跨区域流动的主流将由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为主转变为城市之间人口流动

为主,进入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新常态。农民工数量的增长已经趋缓,2020—2022年农民工数量受新冠疫情影响波动比较大,2023年上升,但仅增加191万人(见表2)。城市之间人口流动逐步成为人口跨区域流动的主流,2023年合肥等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20个城市合计新增156.87万人(张明丽,2024)。

表2 2010—2023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和外出农民工数量变化

年份	农民工总数 (万人)	比上年增加人数 (万人)	比上年增长 (%)
2010	24223	1245	5.42
2011	25278	1055	4.36
2012	26261	983	3.89
2013	26894	633	2.41
2014	27395	501	1.86
2015	27747	352	1.28
2016	28171	424	1.53
2017	28652	481	1.71
2018	28836	184	0.64
2019	29077	241	0.84
2020	28560	-517	-1.78
2021	29251	691	2.42
2022	29562	311	1.06
2023	29753	191	0.6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工业化和人口增长是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城镇化即将迈入后期阶段,背后的根源是后工业化社会和后人口转型阶段的来临。“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ization)”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 Bell)在1973年提出,用以描述工业社会向知识与服务主导社会的转型。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的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假说: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其根源是服务业的低生产率、高成本结构和低增长率(Baumol, et al., 1965)。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使金融、零售、通信等服务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但服务业整体低增长率的状况没有改变(Triplett, et al., 2006)。同时,后工业化社会往往伴随“去工业化”的现象,服务业增长成为吸收工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导致整个社会就业增长的减缓(Nordhaus, 2008),并进而降低城镇化发展速度。“后人口转型(The Post-demographic Transition)”概念,是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会专家利特(R. Leete)在科尔(A. Coale)人口转型阶段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后人口转型阶段,人口出生率下降,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移民成为各个地区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出生率下降从整体上降低了城镇化扩张动力,而移民推动城镇之间的规模分化。

中国正在迈入后工业化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结构从工业主导型逐步向服务经济主导型转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峰值42.0%下降到2023年的31.7%,工业增加值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峰值51.6%下降到2023年的26.8%。相应地,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5年上升到50%以上,在2023年达到54.6%;服务业增加值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5年超过55%,在2023年达到58.9%(国家统计局,2024)。值得注意的是,服务经济主导型并非否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而是强调在比重下降的同时,在产业链上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第二,经济增长动力由固定资产等要素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和消费需求拉动。从2015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迅速下降,基本与GDP增长速度同步,资本积累速度大幅减慢(见图1)。与此同时,企业对技术的研发投入越来越大。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的研发(R&D)与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终消费率从2010年的低点49.3%缓慢上升,到2023年达到55.7%(见图2)。第三,物资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进入物质丰裕的“过剩经济”时代。2013年以来,工业产能利用率多数年份处于低位,产能普遍过剩,社会处于物质丰裕状态(见图3)。根据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物质丰裕是后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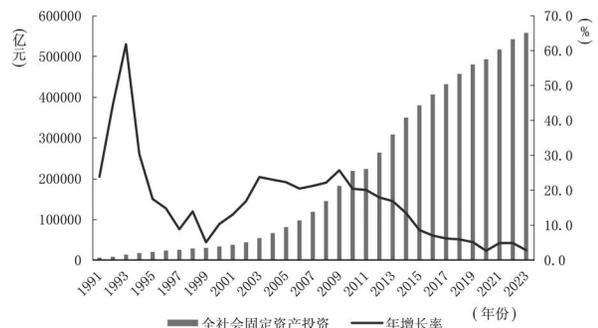


图1 1991—202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4》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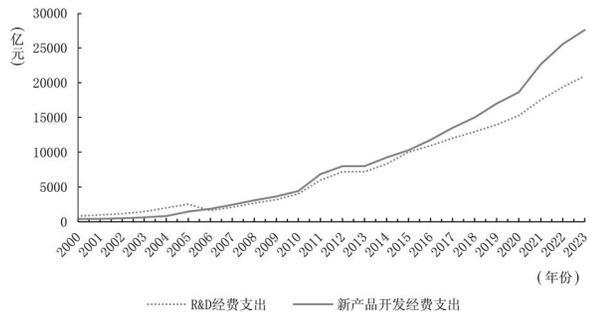


图2 2000—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和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4》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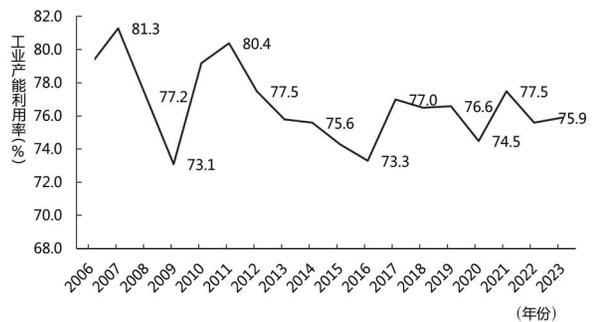


图3 2006—2023年工业产能利用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4》自制。

化社会的重要特征,推动人们价值观从生存目标的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即追求有意义的人生、自由公平环境和生活质量(Inglehart, 2020)。

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型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人口自然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到2020年下降到10‰以下;1997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在2022年下降到-0.6‰。第二,随着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加剧。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00年达到7%,符合国际老年社会标准,2014年超过10%,2023年达到15.4%,属于中度老龄化;2023年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达到22.5%。第三,家庭结构显著变化,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小家庭和单亲家庭普遍增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每个家庭户的平均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了0.48人(国家统计局,2021)。2023年,1人户占家庭户总数的比重增至17.8%,较2013年的14.6%提高了3.2个百分点。

(二)城镇化后期阶段以品质为导向

20世纪50年代,美国掀起社会指标研究运动,开始关注生活质量问题,1958年尔布雷斯首次将“生活质量”引入学术领域(Galbraith, 1958)。一些学者从空间视角研究生活质量,1954年美国学者厄尔曼最早提出“舒适性(Amenity,又译为便利设施)”概念,认为宜人的气候可能是最重要的舒适性,不仅对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压倒性的吸引力,而且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大(Ullman, 1954)。20世纪90年代,规划设计学者在“舒适性”基础上,提出“地方品质”的概念。史密斯指出,地方品质是提供满足居民需求和愿望的物理环境,包括公园、人行道、校园、停车场、街道、花园和户外咖啡馆等空间(Smith, 1997)。佛罗里达指出:“地方品质指的是一系列商品和服务,属于舒适性的广泛范畴。”例如,体现在公园、社区、文化和教育机构以及广泛的社会环境(Florida, 2000)。关于地方品质的构成要素,佛罗里达概括为一组相互关联的体验,包括:第一,有什么?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结合,刺激、吸引人的环境适合追求创造性的生活。第二,谁在那里?不同种族、国籍、宗教、性别和生活取向的人互动,表明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融入并创造生活的

社区。第三,发生什么事?有很多活跃的、令人兴奋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街头生活的活力、咖啡馆文化、艺术与音乐,以及丰富的户外活动等(Florida, 2003)。佛罗里达认为,在这些要素中,最关键的是多样性和宽容性(Florida, 2002)。城市多样性包括经济多样性、人口和社会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与多样性相关联的是城市宽容性,不同国籍、种族、民族、职业、地位、性别和生活取向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都能够获得尊严和自我表达的权利。

现有文献在讨论地方品质时,不再区分具体的空间尺度,包括欧盟、国家、州以及邮编区和社区等,也未能区分不同空间尺度上质量评价的差异。安德鲁斯指出,地方品质由两个部分组成,即质量范围和地方类型,前者包括审美、经济、社会、政治、环境、人类健康、公共安全和其他问题,后者包括人口普查区、社区、市镇、流域、市场区域、县、州、国家和其他空间上不同的单位(Andrews, 2001)。在借鉴国内外地方品质的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聚焦于城市尺度,即为城市品质,是指城市居民就业和生活对城市环境的综合性体验的感知,由自然环境、物理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构成,又可以分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三个方面(Lefebvre, 2014)。中国即将进入城镇化后期阶段,意味着城镇化发展方式将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内涵型转变。

一是由城镇化发展新阶段决定。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体现,也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非农产业的集聚经济性决定了工业化过程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向城镇集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自然历史演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是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也是人们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升的过程。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逐步向更高层次递升,包括追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因此,在城镇化后期阶段,人们对城市品质的追求也必须是持续的、动态的、向上提升的过程。

二是由后工业化社会决定。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工业化通过促进就业、提高收入、改变土地利用方式、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以及吸引农村人口转移等方式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则通过土地开发、劳动力与人口集聚、产业集中以及规模经济

效应反哺工业化发展,形成一种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在本质上,这种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投入驱动。在后工业化社会,城乡之间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空间缩小,城市土地开发的动力减弱,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循环累积因果关系难以持续,对技术创新和创业的依赖性提高,创造力人才聚集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一方面,制造业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密集型服务的融合发展,在生产工艺和产品开发上向高精尖和智能化升级,在全球产业链上向知识密集型环节升级,在附加价值上依赖于研发、设计、品牌、渠道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另一方面,部分服务业的不可贸易性,弱化服务生产方式对规模经济性、运输成本(冰山成本)的依赖性,增强对技术创新和创造力人才的依赖性。服务业涵盖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市场,具有多样性特征,决定了服务创新的复杂性,不仅所依托的技术比工业技术更为多样化,而且在创新方式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服务创新更多地体现“交互作用学习”和“用户——生产者关联”模型(Lundvall, 1992),二者都依赖于创造力人才,而吸引创造力人才的关键是提升城市品质。

三是由后人口转型阶段决定。在后人口转型阶段,由于本地人口增长停滞,移民成为各地维持劳动力和人口结构的关键因素(Leete, 1987)。随着本地人口增长停滞、城乡之间劳动力和人口流动的增长速度减缓,城城之间的劳动力和人口流动成为城镇之间竞争的新赛道,城镇之间的劳动力和人口集聚规模正加速分化。分化的关键因素是城市品质,高品质的城镇才能吸引劳动力和人口集聚。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常住人口增加的地级行政区有184个,减少的有149个,分别占全部地级行政区数量的55.3%和44.7%(林善浪,2023)。

二、城市品质的创造力经济效应

中国即将进入城镇化后期阶段、后工业化社会和后人口转型阶段,意味着长期形成的工业化、城乡人口流动和城镇化互动格局即将发生大变革和大调整,将转变为后工业化社会、城城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后期之间的互动新格局。在这一背景下,创造力人才成为关键变量,城市品质演变为新的区位

要素,对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全局性、历史性和方向性的深远影响。

(一)创造力和创造力经济

创造力(Creativity)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现代意义的创造力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通常是指一定目的和条件下产生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新思想、新方式、新产品或新服务的综合能力。1950年,吉尔福特提出应采用心理测量学的方法研究普通人的创造力(Guilford, 1971)。20世纪50—60年代,个体创造力是学界研究重点。20世纪70年代起,创造力研究逐渐关注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认为创造力源于个体认知因素、动机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通过与环境的动态交互作用,最终形成创造性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了组织创造力(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工作场所创造力(Workplace Creativity)、社区创造力(Community Creativity)、城市创造力(Urban Creativity)、农村创造力(Rural Creativity)、国家创造力(National Creativity)等概念和新的研究领域。与个人创造力(Individual Creativity)相对应,这些概念都属于集体创造力(Collective Creativity),意为在团队、群体、组织或地区等层面上不同个体以不同形式共同努力形成的创造力。

创造力是蕴藏在个体和群体中的一种能力,而创新和创业等创造性活动是发现机会、实施运用机会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创造力是创造性活动过程的第一个关键的要素,创造性活动是依赖创造力提出新想法、新方式、新产品或新服务,并加以实施的后续阶段,是创造力实现的过程。城市创造力是以城市为空间尺度考察的集体创造力,是众多的个体创造力、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创造力及其与城市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创造力。

“创造力经济(Creative Economy)”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帕滕(S. Patten)1912年发表的《经济理论的重建》,而现代意义上的“创造力经济”概念,最早在2000年由科伊提出,认为工业经济正在让位于创造力经济,企业将不得不做出应对和改变(Coy, 2000)。2001年霍金斯(J. Howkins)出版了《创造力经济》。2002年佛罗里达出版了《创造性阶层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系统地阐述了创造力、创造性阶层和创造力经济的关系。创造力经济是由个体和集体创造力驱动的经济

济形态,以创造性活动为基础。创新和创业等创造性活动用于描述微观行为,创造力经济是对一个行业、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动力机制和部门构成等属性的综合描述。与包括个体创造力和集体创造力的创造力相对应,创造性活动主体包括个体创造性活动,也包括各类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等从事的集体创造性活动。各类营利性主体都可从事创新活动和创业活动,公共研发机构、教育机构、非营利文化艺术团体、社会公益组织、慈善机构、宗教团体等各类非营利主体也可从事创新活动和创业活动。在人类社会不同阶段,创造力经济的重点领域不同。在工业经济时代,创造力经济的重点是工业领域创新创业活动;在服务经济时代,创造力经济的重点是服务领域创新创业活动。历次科技革命时期,新技术领域是最活跃的创新创业活动。

(二)城市品质的创造力经济效应

城市品质影响创造力人才集聚和创新创业的活动集聚,高城市品质吸引创造力人才集聚,进而引致创新创业活动的集聚。

1.城市品质影响创造力人才集聚

从全球范围看,高层次人才流动性大,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相较于普通劳动力,发明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中更加活跃,发明人才流动呈现全球性的“中心—外围”格局,越来越集中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少数国家(郑江淮等,2023)。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0—2010年,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高技术移民增长130%,总量达到2800万人,同期低技能移民只增长40%左右。高技能移民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吸收了约2/3的高等教育学历移民。在高端人才中,美国85%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拥有移民背景(World Bank, 2018)。在一个国家内部,高层次人才主要流向和集聚在少数地区,美国仅四个州的10个县接收了一半的移民。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扩大,创造力人才的流动性正在提高,呈现“名校聚集”和“东南部聚集”现象(黄海刚等, 2018)。2014—2019年中国“高被引科学家”的省际流动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四川等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和江苏处于“中心—外围”结构的核心区域(靳军宝等,2021)。创造力人才的高流动性和高集聚性,与其工作和生

活区位的选择偏好有关,表现在:

第一,就业区位偏好。一般认为,就业机会和薪酬待遇是吸引创造力人才的重要因素。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与创造性人才相关的工作条件比其他经济因素更关键,包括丰富的学术资源与网络、与杰出同行合作的机会、先进的研究设施以及充足的研究资金等(Stephan, et al., 2015)。创造力人才的工作都与知识有关,阿海姆和汉森把创造力人才依赖的知识分为分析知识、综合知识和符号知识三类,认为依赖不同知识类型的人才对就业地点的选择不同(Asheim, et al., 2009)。分析知识是指主要侧重于科学发现和通用技术发明的活动,研究与开发(R&D)、编码知识交流环境是分析知识型人才最看重的。综合知识是指侧重于将现有知识形式应用于新用途的行业,如工程领域、专业先进工业机械和采掘业先进设备等制造业,更具体的诀窍、工艺和实践技能需要互动学习来解决,而隐性知识交流、商业环境是综合知识型人才最看重的。萨克森宁指出,硅谷不同公司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下班后会在Wagon Wheel酒吧聚会,这家酒吧被称其为“半导体行业的源泉”(Saxenian, 1996)。符号知识指“意义和欲望”的创造,涵盖广告、设计、品牌、时尚、电影制作、出版及音乐等媒体领域。这种知识通常要求深刻理解特定社会群体的习惯、规范以及“日常文化”,并通过“身临其境”来获取,而人际氛围是符号知识型人才最看重的因素。可见,创造力人才对就业区位的选择,取决于良好的研发环境、知识交流环境和人际交流氛围。

第二,居住区位偏好。创造力人才通常从事与知识相关的工作,具有较高的收入,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具有独特的生活偏好。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坚守。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和不同时代的建筑共同构成一个城市独特的物质形态,浩渺的历史烟云、文化的演绎脉络构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家底”,体现了佛罗里达所说的地方“真实性”或独特性和声誉(Florida, 2016)。创造力人才的知识工作属性,对历史建筑、成熟社区、独特文化属性,具有天然的偏好。其次是休闲偏好。时代变迁,科技进步,物质富足,休闲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但创造力人才在繁忙职场之外拥有闲适的心态和追求雅致的内心。最后是社交偏好。随着历史更替和时代进步,社交方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型社交方

式和社交空间不断兴起,仍无法取代线下现实生活中的“熟人社交”。酒吧、休闲餐厅、画廊空间、咖啡馆、夜总会、剧院、音乐厅和健身中心等消费设施是形成社区感和归属感的社交空间,也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第三空间,人们聚集在这里开展社交互动、享受彼此陪伴、交流信息和知识、建立网络和商业关系。

创造力人才对于工作和生活区位的选择偏好,决定了创造力人才要追求高城市品质,或者说,高城市品质吸引创造力人才集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在城市品质构成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具有不可移动性和不可贸易性。随着现代交通体系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可移动性和可贸易性的东西,人们在任何地方皆可得到。对于不可移动性和不可贸易性的东西,需要通过人或组织的移动才能得到。不可移动性和不可贸易性的物品和服务通常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个人消费服务、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历史文物和文化等,包含创新生态系统和创业生态系统。

第二,城市品质是公共—私人长期持续集体行动的结果,具有不可复制性。城市是人类社会与特定地理环境长期互动演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要素的空间载体。城市品质是政府、社会组织、工商企业和居民持续共同努力的产物,是长期累积形成的。因此,城市品质的许多部分具有不可复制性,高城市品质总是稀缺的。

第三,城市品质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引致创造力人才外部性。城市多样性和包容性能够兼容各种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专长的创造力人才,形成创造力人才外部性。创造力人才外部性,一方面来自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即知识和技能的正式和非正式互动分享(Lucas, 2001);另一方面来自多样化创造力人才的互补性。塞里索拉把创造力划分为艺术创造力、科学创造力和经济创造力三种类型(Cerisola, 2018)。具有艺术创造力、科学创造力的人才并不一定具有经济创造力,而具有经济创造力的人才不一定具有艺术创造力、科学创造力。如果创造力人才越是多样化,各种类型创造力人才数量越多,互补和协同效应就越大,艺术创造力、科学创造力人才结合经济创造力人才,艺术、技术转化为产品、产业的机会就越大。创造力人才外部性,反过来成为进一步吸引并留住各种各样的创造力人才的重

要因素,是创造力生态系统的关键。曾克发现与其他职业相比,城市的宽容性、文化多样性、城市形象、购物和文化活动对创造力阶层的吸引力更高,而生活成本、住房负担的吸引力比较弱(Zenker, 2009)。

2.城市品质影响创新创业活动的集聚

高城市品质吸引创造力人才集聚,进而引致创新创业活动的集聚。无论是全球范围还是一个国家范围内,创新活动和创业活动都呈现高度集聚现象和创新比产业更加聚集、创业又比创新更加集聚的现象。

从创新空间看,创新活动呈现高度集聚的特征,尤其是少数大都市区集中了主要科技产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报告,将专利和科学出版物数量排名后,美国50个州中的前3个州集中了全国近40%的专利和近30%的科学出版物;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前3个集中了全国56%的专利和35%的科学出版物;中国33个省级行政区(不含台湾)中的前3个拥有60%的专利和近40%的科学出版物。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全球174个全球创新热点(global innovation hotspots)和313个专业利基集群(specialized niche clusters),集中了全球85%的专利和81%的科学出版物。这些创新密集区主要集中在东京、纽约、伦敦、巴黎、北京、首尔、洛杉矶、大阪、上海、莫斯科、深圳等大都市区(WIPO, 2019)。根据中国高水平科技创新产出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底,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有效量分别达到130.8万件、70.3万件和67.2万件,合计占全国总量的65.6%(邱海峰, 2024)。

从创业空间看,创业活动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区内部的少数社区。根据佛罗里达等人对风险投资的分析,2015—2017年全球十大城市占全球风险投资支持初创企业投资总额的62.0%,旧金山湾区、北京、纽约、圣何塞、波士顿、上海等六大城市占51.2%。从大都市区内部看,高科技创业活动呈现出社区层面的微集群。美国排名前20位的邮政编码区吸引的风险资本投资超过100亿美元,约占全国总额的1/3;83个邮政编码区吸引的风险资本投资超过1亿美元,邮政编码区只占全国的0.2%,而吸引的风险资本投资额占全国的60%以上(Florida, et al., 2020)。从中国国内看,北京、上海和深圳是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的集

中地,管理人数量、基金数量、基金规模分别占2022年全国存量的47.23%、50.67%和52.63%(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24)。

创新和创业活动集聚,除了创造力生态系统及其引致的创造力人才集聚因素,也与创新生态系统、创业生态系统有关。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基础设施是推动创新的必要前提和支撑条件。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创新活动越来越依靠投资大、工程建设时间长的大科学装置,包括各类大型科研基地、大型实验室和其他科研设施设备。与其他基础设施类似,具有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外部性(刘生龙等,2010)。在创业生态系统,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行为是生态系统的核心,创业资源提供者是另一组重要参与者,包括公司、大学、公共部门机构、金融机构等。其中,孵化器和加速器是常见的专业基础设施,也是最重要的创业资源,是促使创业集聚的网络外部性(Minniti, 2005)。可见,创造力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和创业生态系统,是城市品质重要的组成部分,嵌入到城市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中(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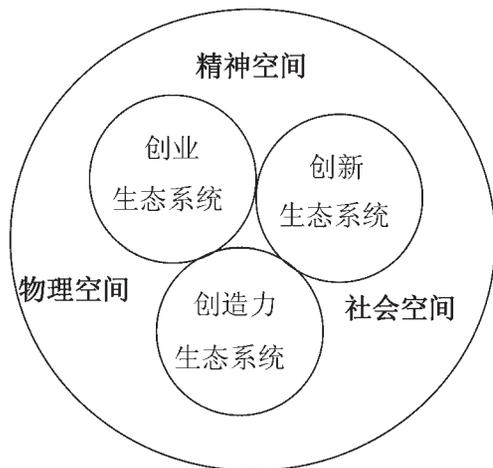


图4 城市品质构成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推进以品质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

伟大的城市富有产生创造力、激发创新和创业活力、繁荣创造力经济的品质。适应工业化社会、后人口转型阶段和城镇化后期阶段的新常态,必须优化城市“软”环境,推动人才自由流动,建设创新型和创业型城市,推进以品质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培育和发展创造力经济。

第一,优化城市“软”环境,建设富有创造力的品质城市。建设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就是要转变城市发展的模式,要让城市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空间载体,“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习近平,2020)。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环境、体制机制改革等多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人居环境是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环境,要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兼顾“硬”环境和“软”环境。在持续改善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前提下,需要把“软”环境建设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在城市“软”环境建设中,尤其在城市更新中,要突出城市第三空间,既要完善包括餐馆、酒吧、酒店、主题公园等个人服务消费环境,也要保护历史古迹、历史街区、民俗文化等“真实性”文化,更要留住公共空间,丰富文化娱乐、街头艺术、休闲运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另一方面,培育和提升城市创造力。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扭转传统应试教育的体制和机制,培养具有创造力的青少年;突出职业教育发展和终身学习环境建设,把培养熟练劳动力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加快高等教育、科研院所等高层次创新资源发展,推进校地地融合,构建政府、企业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共同支持高层次创新的氛围;扩大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把学生保留率和毕业率、留学生比例和毕业率作为城市政府、教育机构的重要考核指标。

第二,推动创造力人才的自由流动,释放城市创造力。释放城市创造力,首要任务是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构建创造力人才公平竞争、充分流动的环境。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需立足后工业化、后人口转型和后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宏观环境变革,突破传统思维定式,重新审视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时代价值。首先,推动创造力人才流动,实现从“数量红利”向“效率红利”的劳动力配置转型。推动制度创新,制定《反就业歧视法》,促进城乡、地区以及不同所有制、体制和行业间的创造力人才流动。一方面,需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化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劳动保障、劳动管理和教育领域的改革,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为人口自由迁徙和跨区域、跨部门就业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优化城市治理,提供新市民可负担的住房,增强社会信任与合

作,化解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矛盾。其次,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加快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步伐。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区人口超过1500万的大城市外,全面取消其他城市各类显性或隐性的落户限制,将大城市打造为吸引人口迁移和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暖心城市”。再次,建设体现城市多样性和宽容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人员、技术、产业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宽容性对城市激发创造力、激活创新创业活力、发展创造力经济至关重要。要在制度、政策和观念层面接纳并包容外来人口,引导促进融入当地文化与生活圈。最后,适度且有针对性地放宽外国技术移民政策。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从限制到放宽移民政策的经验,根据产业劳动力需求,以学历和专业技能为核心标准,有选择性地吸引外国技术移民,既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技术劳动力支持,又推动文化多样性发展及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第三,分类分层次建设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打造创新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之所以对创新很重要,关键在于其外部性,不仅是知识溢出的外部性,还在于创新设施的外部性。对创新设施的投资需要划分各级政府的责任,分类分层次建设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第一层次,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综合性创新生态系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具有创新基础设施优势和吸引全球高层次创造力人才优势,应遴选一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集中国家和地方政府资源,大规模建设创新专用设施,并以此为平台集聚一批全球高层次创造力人才,构建具有全球前沿水平的创新基础设施,研究开发与未来产业、未来科学相联系的具有前沿性的全球领先创新成果。第二层次,服务区域、面向全国的特色创新生态系统。南京、武汉、成都、西安、杭州、苏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应遴选一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通过国家财政投资、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投资,加大对特色创新专用设施投资,形成一批具有全国或全球特色的专业创新基础设施,集聚区域和全国高水平创造力人才,以特色创新设施和特殊领域的创新成果,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第三层次,服务面向区域的创新生态系统。多数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应遴选一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大型企业,以国家财政补贴、省级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建设一批与区域优势

产业群相联系、具有区域特色的专用创新基础设施,集聚一批区域高水平创造力人才。一般地级城市应遴选一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大型企业,以省级政府财政补贴、地级城市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建设一批与地方优势产业群相联系、具有地方特色的专用创新基础设施,集聚一批应用性研究专长的人才,以服务地方优势产业的应用性研究为主,形成特色研究成果,参与区域性空间竞争。

第四,优化创业环境和政策支持,打造创业型城市。创业活动离不开创业生态系统的支持,核心要素包括企业家精神、金融资源、知识支持服务及社会人文环境。创业生态系统促进了创业者的互动,扩大了创业资本和创业的溢出效应(Stam, et al., 2016)。在创业生态系统建设,首先,重视以大学为中心的创业生态系统。大学在创业生态系统中极为活跃,应将技术转让办公室、大学孵化器和与合作研究中心等大学内部组织,嵌入到创业区域中(Hayter, et al., 2017),对制定区域创业政策发挥作用。其次,强化孵化器创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而言,平台孵化型、天使孵化型等孵化器依托企业或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从而具有资源优势,利用社区型孵化器低成本优势,探索“天使投资+创业辅导”等创新孵化模式。最后,营造保护和爱护企业家的社会环境。21世纪以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欧美极右势力的兴起,不仅促成逆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政治力量,也滋生了“仇富”和贬低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与思潮。这些国际趋势和思潮值得中国高度警惕,必须加强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的法治化建设,营造尊重和支持企业家精神的环境。

第五,积极发展城市创造力经济。博阿和托普库指出,创造力经济是创造力个人和团体活动的结果(Boğa, et al., 2020),创新和创业包括知识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创新和创业,都是创造力经济的基础。一方面,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创造力经济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包括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针对中国实际情况,实施产业链分类升级,分门别类推进制造业向高端化发展,推动传统服务业向数字化转型,培育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另一方面,要重视非知识密集型的创造力经济,就一个地区或城市而言,非知识密集型创新和创业对国计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支持传统产业领域的创新创业活动。

参考文献

- [1] ANDREWS C J. Analyzing quality-of-pla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1, 28(2): 201—217.
- [2] ASHEIM B, HANSEN H K. Knowledge bases, talents, and contexts: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creative class approach in Sweden[J].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85(4): 425—442.
- [3] BOČA S, TOPCU M. Creative economy: A literature review on relational dimensions, challeng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Economics, 2020, 8(2): 149—169.
- [4] CERISOLA S. Multiple creative talent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at the local level[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018, 42(2): 243—269.
- [5] COY P. The Creative Economy[J]. Business online: August, 2000, 28.
- [6] FLORIDA R, ADLER P, KING K, et al. The city as startup machine: the urban underpinnings of modern entrepreneurship[J]. Urban stud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2020: 19—30.
- [7] FLORIDA, R. 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J]. City & community, 2003, 2(1), 3—19.
- [8] FLORIDA R.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 92(4): 743—755.
- [9] FLORIDA, R. What draws creative people? Quality of Place[J]. Urbanland, The magazine of the urbanland institute, 2016.
- [10] FLORIDA, R.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 92(4), 743—755.
- [11] GALBRAITH J K. The affluent society[M].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8:8.
- [12] GUILFORD J P. Some Misconceptions Regarding Measurement of Creative Talents[J].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1971, 5(2): 77—87.
- [13] HAYTER C S, LUBYSKY R, MAROULIS S. Who is the academic entrepreneur? The role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spinoffs[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7, 42: 1237—1254.
- [14] HEILBRUN J. Baumol's cost disease[R]. 2003.
- [15] Baumol W J, Bowen W G. On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anatomy of their economic problem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5, 55(1/2): 495—502.
- [16] INGLEHART R.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17] LEETE R. The post-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 similarities and contrasts with Europe[J]. Population studies, 1987, 41(2): 187—206.
- [18]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M]// The people, place, and space reader. Routledge, 2014: 289—293.
- [19] LUCAS JR R E. Externalities and cities[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1, 4(2): 245—274.
- [20] LUNDEVALL B Å.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globalization[J]. The learning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s of hope, 2016, 351.
- [21] MINNITI M. Entrepreneurship and network externalit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5, 57(1): 1—27.
- [22] NORDHAUS W D. Baumol's diseases: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J]. The B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8, 8(1):1—39.
- [23] NORTHAM R M. Urban geography[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9.
- [24] SAXENIAN A L.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with a new preface by the author[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5] SMITH T, NELISCHER M, PERKINS N. Quality of an urban community: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and physical form[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7, 39(2-3): 229—241.
- [26] STAM E, SPIGEL B.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R]. US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6.
- [27] STEPHAN P, SCELLATO G, FRANZONI C.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PhDs and postdoctoral scholars: what does (and does not) matter[J].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2015, 15(1): 73—113.
- [28] TRIPLETT J E, BOSWORTH B P. 'Baumol's Disease' has been Cured: IT and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in US Service Industries[C]//The New Economy and Beyo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6.
- [29] ULLMAN E L. Amenities as a factor in regional growth[J]. Geographical review, 1954, 44(1): 119—132.
- [30]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port 2019: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Local Hotspots, Global Networks[M].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9.
- [31] WORLD BANK. Moving for prosperity: global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s[M]. The World Bank, 2018.
- [32] ZENKER, S. Who's your target? The creative class as a target group for place branding[J]. Journal of pla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2009, 2(1), 23—32.

- [33]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N].中国信息报,2021-05-12(002).
- [3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统计,2024,(03):4—21.
- [35]黄海刚,曲越,连洁.中国高端人才过度流动了吗:基于国家“杰青”获得者的实证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6).
- [36]靳军宝,曲建升,吴新年,等.中国高层次科技人才省际流动复杂网络特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1(21).
- [37]林善浪.加快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7).
- [38]刘生龙,胡鞍钢.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J].经济研究,2010(3).
- [39]邱海峰.中国成为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01-17.
- [40]桐欣.城镇常住人口已达9.3亿新型城镇化未来空间和重点划定[N].第一财经日报,2024-10-08.
- [41]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J].求是,2020(21).
- [42]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摘编)[N].人民日报,2021-03-06.
- [43]张明丽.谁是2023年人口增长最多的城市?[J].财经,2024(10).
- [44]郑江淮,孙冬卿,戴玮,等.全球发明人才流动网络空间结构的多极化变迁[J].财贸经济,2023(10).
- [45]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年报2023[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

Quality-Oriented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Creative Economic Effect

Lin Shanlang Ling Jiahui Lin Zeyu

Abstract: China is entering the late stage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post-population transi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urbanization will change from scale and speed to quality and connota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long-established patter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urbanization will face new changes, and the urban quality has become a key variable in the new stage of urbanization. Urban quality attracts creative talent and promotes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driven by creativity and based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t'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soft” environment of cities, promote the free flow of talent, build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cities, and cultivate and develop the urban creative economy.

Key Words: Urban Quality; New Urbanization; Creativity; Creative Economy

(责任编辑:彦 伦)